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7 讲，解释史 – 培根与康德

© 2024 Dave Ma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我们一直在讨论历史上对诠释学或圣经解释的影响，在上一届会议上，我们一路回到旧约本身，以证明解释对于 20 或 21 世纪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坐下来研究圣经。解释圣经，但解释要追溯到旧约本身。即使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发现后来的作者挑选、采纳、解释和利用早期的文本，并向他们的读者重申它们，我们也研究了解释旧约文本的新约作者。我们还研究了拉比犹太教，研究了教父时代的早期教父，并非常简要地研究了宗教改革的跳跃，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关键特征之一是解释者着眼于宗教改革。文本是相关的，并试图使文本与现代读者相关，不一定是我们想重复他们所有的方法，但同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正在看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将其视为人工制品简单地在其历史背景下进行解释和理解，但他们也在努力思考神的话语如何继续具有相关性。

在本次会议中，我想做的是进一步向前迈进一点，看看对解释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不一定来自于解释圣经文本的尝试。其中一些确实如此，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解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不只是坐下来阅读文本，而是当你这样做时，或者孤立地阅读文本时，当你这样做时，当你坐下来解释圣经文本时，你这样做是作为长流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一长串的人坐

下来与文本搏斗，但你也受到许多其他人的思想和许多其他运动的影响，这些运动影响我们理解的方式，我们阅读的方式，我们的阅读方式。我们解释。

再说一遍，其中一些影响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其中一些影响不一定针对圣经文本，也不一定旨在解释任何文本或书籍。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在努力思考如何理解数据，如何理解任何事物的含义。所以我想做的是看看一些关键的影响，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在总体上勾勒出一些草图，看看一些主要人物和他们所具有的影响，特别是在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时期，当理性以及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被高度重视作为理解某些事物的方式，作为解释某些事物的方式，无论它是科学数据还是文本。

我想简要介绍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培根的人，培根是一位早期的科学思想家，是归纳科学方法运动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培根是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强调人类思维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从而从文本中推断出意义。培根主张对科学数据进行严格、详细的实证研究。

这意味着解释者是一个观察者，研究数据和信息，而不让他或她的个人偏见或其他影响影响解释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观察者查看并研究数据，不要让这些偏见成为障碍。通过检验物理证据、历史证据和历史事实，如果运用正确而严格的方法，支配这些事实的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并显现出来。

而培根所做的就是建议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甚至怀疑传统，我们才能回到数据本身。再次，通过一种严格的方法从经验上看待事实，人们就可以理解支配这些事实的规律和这些事实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今天，我认为我们在圣经研究中的某些运动中看到了类似的影响，这些运动既流行，有时也是学术的，强调对圣经的归纳研究。

这样，通过严格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通过严格检查数据，人们可以揭示其真实含义，人们可以理解其真实含义，文本将揭示其含义。所以，你会再次发现，圣经的解释者是客观观察者这一事实得到强调，我们看文本中的数据，我们只是看事实，凭经验观察其中的内容，并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运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含义，并且我们可以确定文本在说什么。因此，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远离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倾向、我们过去的传统以及类似的事情，以便达到文本的真正含义。

再说一次，许多诠释学文本仍然谈论归纳解释方法，而且还有更流行的圣经研究被贴上归纳圣经研究或类似的标签。再次，假设是，我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我就像一块干海绵，等待吸收数据，通过对圣经文本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然后我可以推导出它的真正含义，不受和不受我的偏见的影响。因此，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与其说间接影响了圣经解释学，不如说他是整个方法的一部分，是这种方法的典范，人们可以通过应用严格的解释方法，超越或克服自己的偏见，并以纯粹的、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理解数据。

我想向您介绍的下一位思想家是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还有笛卡尔，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左右，1596年到1650年。笛卡尔和培根一样，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产物，强调知识来自于逻辑推理。

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能够获得意义。笛卡尔说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自我。因此，我可以看数据，我可以看物质世界，我可以逻辑地理解它。

笛卡尔也是从怀疑的立场出发的。也就是说，科学家或哲学家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传统。他们必须抛弃传统，抛开偏见和假设，并且在解释数据时必须重新开始。

现在，培根和笛卡尔假设知识与现实本身之间存在大致相关性或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理性的、经验的、科学的方法可以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我的认知和解释与它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所以，比如说，当我观察这本书的时候，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和看到的，我的认识和我的观察，以及实际存在的东西，实际的现实本身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通过应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成为中立的观察者。通过对数据应用归纳方法，通过用理性归纳方法来理解，我们可以以纯粹的方式来理解它，我们可以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再说一次，不难看出它对解释学方法可能产生的影响。解释圣经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对待，在这种影响下，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对待，可以以中立的方式来对待，然后通过严格的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它。解释方法，通过严格的解释学方法，人们可以得出一种实际上符合圣经本身文本的解释。也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解释，我可以得到理解，我可以得到文本的含义，它与文本中的实际内容直接相关。

再次，脱离我自己的偏见、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传统和我自己的观点。通过运用严格的方法，我可以成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再次，有点像一块等待吸收数据的海绵。

所以在解释学方面，至少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在解释上是有影响的。再说一次，如果你听说过、被教导过或读过，解释学的正确方法是放弃你的预设和偏见，客观地处理文本，并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你就能克服你的偏见，你就能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这种方法大部分源于这段理性主义时期，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两个人，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主要强调他们在诠释学方面留下的遗产。关于笛卡尔还有其他几件事要说，就他留下的遗产和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甚至在圣经解释方面，笛卡尔还引入了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在后来的解释学和解释学中变得非常重要和神学。他说，基本上，二元论是这样的。

一方面，笛卡尔明白存在一个机械的物质世界，它遵循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它是确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笛卡尔坚持思想家、理性思想家的自由和自主。

这意味着，如果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自我，一个自主思考的自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自己对它的解释，或者我自己的观点和观点？人类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将如何理解数据本身？所以笛卡尔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一件事，这种方法，伊曼努尔·康德，我们稍后会看到的人物之一，伊曼纽尔·康德将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并开始为甚至现代的解释方法铺平道路现在主要关注读者。由读者决定意义，文本中没有正确的意义。

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偏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观点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毫无疑问会将这些内容读入文本中。因此，笛卡尔已经通过他的机械宇宙和自主思考自我之间的二元论为此铺平了道路，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所看到的東西，而我的方法决定了我所看到和感知的东西在数据中？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人物，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一些人，他们可能影响了诠释学，我们稍后会非常简短地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怀疑论，大卫·休谟的怀疑论，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但需要强调一个人，因为我们经常在解释圣经解释或解释学教科书中找到反映这种思维的陈述，但要非常简单地提到一个人是约翰·洛克，洛克，约翰·洛克，1632年至1704年。

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空白的平板电脑，它从外部世界接收感觉。所以我的大脑是一块白板，等待着简单地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世界的感觉和数据。再一次，我看过无数的诠释学教科书，特别是在早些时候，这些教科书说，解释者，就像培根所说的那样，可以作为一个纯粹客观的观察者，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来看待文本，头脑是一块白板，就像一块海绵，等待着以纯粹归纳和纯粹客观的方式吸收数据。

我们将会看到，洛克立场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稍后会在其他一些解释者和其他解释学中看到这一点，这个术语用于应用或思考和撰写解释学的人，但批评之一——如果我的头脑是一块空白的石板，如果它只是一块空白的平板电脑，我怎么能理解任何事情呢？一个人必须有某种范畴或某种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但除了洛克之外，下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许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群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一个名叫伊曼纽尔·康德的人。生活于1724年至1804年的伊曼努尔·康德基本上在某些方面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怀疑论。

再次，他回应的怀疑论者之一是大卫休谟，他根本怀疑任何人类知识的确定性。作为回应，康德试图摆脱这种怀疑。他所做的是说，基本上，人类的思想是知识的最终来源。

换句话说，客观现实，但根据康德的观点，客观现实只有在符合心灵的认知结构时才能被认识和感知。因此，他比笛卡尔走得更远。请记住，笛卡尔在能够理解理解和感知数据的自主思考自我之间引入了一种二元论。

现在，康德更进一步说，客观现实，因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类别，因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所以只能知道外面的事物。换句话说，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事物客观存在的方式永远无法被了解。相反，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心灵的结构和人类心灵的理解类别来过滤的，例如允许我们区分时间的类别、空间类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经验世界。

因此，根据培根和笛卡尔的说法，也许一个人可以观察一个物体，我们如何感知它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我的理解和认识与物体本身的本质之间会有直接的相关性。现在，康德说，相反，心灵、心灵的结构决定了我所看到的。因此，我如何看待和理解这本书，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客观地理解它，或者是否真的理解它，因为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类别和结构决定了我如何看待它。

所以我对它的理解是通过理解模式、人类头脑中已有的类别来过滤的。再说一次，根据培根的说法，尤其是在笛卡尔的著作中，大脑可以客观地感知数据的实际情况。但现在康德说，不，心灵，心灵的结构决定了我如何感知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世界。

心灵的结构决定了如何解释世界。我的了解与实际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我不能确定我所知道的是否一定与外界的客观相符。

伊曼纽尔·康德还有另一项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伊曼纽尔·康德说，有两个极点，也许再一次，让笛卡尔思考得更远一点，在自由和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二元论，或者再说一遍，思想的自由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决定论统治着世界的运转方式。对于康德来说，自由的极点包括诸如信仰、宗教和上帝之类的东西。

因果关系的极点，极点的对面是时空和历史的科学世界。根据康德的说法，两者都不能相互影响。当涉及到科学、历史和外部世界时，根据科学探究的方法，人们无法理解信仰、上帝和宗教。

因此，历史和这个决定论世界之间存在着这种二元论，然后是自由的极点，其中包括上帝、信仰和宗教。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都看到了这种影响。例如，信仰、我的信仰和宗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我对神的信仰是超越的，甚至是独立于事实的。然而，历史和科学只是因果领域，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奇迹，没有神圣的干预历史。再次，将这两根杆分开。

人们不能将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与宗教观念、上帝和信仰的领域混为一谈。我们再次看到，今天，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仰再次是个人的、不依赖于事实的、无法被证明的东西。此外，我们还看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仍然在旧约和新约研究中看到这种思想的遗产，在信仰和历史之间仍然经常看到的二分法，尤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特征。20世纪。

甚至更进一步，神学和历史的脱节。例如，《旧约》作者写的是宗教文学、神学文学，而不是历史文学。因此，诸如上帝将红海分开以便整个国家可以步行之类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也肯定不会发生。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作者感兴趣的是神学，而不是历史。或者符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他们写神学时，他们不一定在写历史。所以你可以看到康德在信仰和历史之间的这种二分法的某种意义上的持续影响，或者在福音批评或旧约批评中，神学和历史之间的二分法。

如果作者正在撰写神学文献，那么他们肯定对历史事实或书写历史不感兴趣。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康德说知识是由基于文本的感官印象的经验组成的，每一秒都通过心灵的类别来理解，使我能够组织数据并解释世界。再说一次，康德要强调的要点是，与培根和笛卡尔不同，他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独立地了解事物，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事物的实际情况。

再说一次，我无法知道它的实际情况。但相反，我只能通过我的头脑网格，通过我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来了解它。所有的意义和理解都是通过这个网格过滤的。

但正是这个网格让我能够理解。这是成为一个自主思考的自我、一个自主思考者的结果。因此，我，即思考的自我，决定了我如何看待事物。

我们了解事物，了解它们在我们看来是如何的，但不一定是它们客观、现实、本身的样子。因此，从一方面来看，康德从未完全摆脱他所回应的怀疑论。因为你想一想，如果我无法了解某件事的真实情况，如果我对某事的感知和知识独立于该事物的实际情况，如果我的了解和某件事的实际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那么我可以'那么我就不能确定我所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因此，在这方面，康德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所回应的怀疑论。而且，当谈到自然、世界、历史、科学知识时，不可能有超自然现象。再次，宗教、上帝等。

属于不同的极点，即自由极点，而科学、历史等则属于封闭的机械宇宙。不过，与培根和笛卡尔一样，康德仍然强调人类思想是意义和知识的主要来源。

正是通过自主思考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才能够认识和理解。不过，正如我们所说，对于康德来说，人们只能通过心灵的网格，即已经存在于心灵中的类别来了解。因此，我无法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了解我所理解和感知的事物。

因此，伊曼努尔·康德的遗产是，解释者是意义的中心。解释者，即认识的自我，是意义的中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康德开始预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预见了更现代的解释学方法，强调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

在本课程的一开始，我想我们提到诠释学似乎贯穿并围绕解释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作者、文本和读者。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关注作者的意图。

以文本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意义所在。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关注读者作为理解文本的人。因此，康德已经预见到更多的后现代解释方法和更多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这些方法关注理解文本的读者。

也就是说，意义在于旁观者的眼中。我们简单抽象的文本中并没有正确、客观的含义。但相反，唯一的意义是作者、读者通过思想的范畴、通过我们给文本带来的预设、偏见和观点所理解的内容。

这将影响我们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方式。这似乎已经被康德预见到了。然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第二个遗产是，首先，当涉及到科学、历史等时，排除超自然现象。

排除超自然现象，排除神对历史事务的干预，这再次意味着没有复活，没有红海分开供整个国家跨越，没有奇迹事件。此外，与此相关的是，康德的遗产是神学与历史的分离。如果老的新约作者正在写神学，他们一定不关心或不写历史。

这种想法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康德，他提出了这一点，并利用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与宗教和对上帝的信仰领域的真实性之间的二元论。作为回应，我想回

应康德，当我们思考解释学时，我们将总结我们所研究过的这些人的贡献，弗朗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约翰·洛克，最后是伊曼纽尔·康德。正如我所说，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其他人和其他个人对诠释学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再说一次，没有有意识地思考解释学，只是因为它们正在处理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如何知道，无论是科学数据还是书面文本，我们如何知道某事？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确实对诠释学和诠释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一些进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关于康德，还有其他培根和笛卡尔，以及约翰·洛克，首先，特别是康德提醒我们，我认为，不存在纯粹归纳法这样的东西。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解释者。

通过严格的方法论，严格应用正确的技术，可以以某种方式解释圣经文本，就像你只是一张白板，只是等待吸收信息。并且您可以绝对确定您的解释与文本本身的对象之间存在一对一的相关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将更多地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存在完全客观的观察者和客观的解释者。

我们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倾向、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背景和传统，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现在，我们稍后将在本课程中处理的问题之一是，这是否不可避免地扭曲我们阅读圣经文本的方式？难道理解圣经文本就没有希望了吗？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注定意义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无法希望获得文本的正确含义。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在解释学思维中将变得更加突出，即不存在纯粹的演绎，我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拿着一块白板，等待浸泡或者一块等待吸收数据的干海绵，我可以完美而纯粹地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个回应是，根据康德的论点，我认为基督徒会争辩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创世记第一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他将结构和类别植入了我们的世界。人类的思维使我们能够按照上帝创造事物的方式来感知事物。因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人类的创造者按照他的形象将这些结构置于康德所描述的类别中。再说一次，我们不能头脑一片空白。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永远无法理解任何事情，但上帝亲自在人类头脑中创造了结构、类别和网格，使我们能够按照他创造事物的方式来感知事物。但基督教的解释者也会承认，由于人类的堕落和人类的罪性，我们并没有完美无遗地做到这一点。由于人类的罪孽，这影响了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

这影响了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现在，这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任何事情？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作为回应的一部分，我认为大多数解释者，大多数基督教解释者都会建议并认识到，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彻底地理解某些事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充分理解某些事物和实质上。所以，综上所述，总结这些人的贡献，首先，康德和笛卡尔以及培根和约翰洛克的遗产就是强调经验主义和人类理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客观地解释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能够客观地，通过使用人类理性，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论，人们能够理解某些东西。一个人能够知道一件事。

根据培根和笛卡尔的说法，我的认知基本上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同样，根据约翰·洛克的说法，一个人可以以一种空白的头脑、没有任何偏见的方式来对待某件事，并且能够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或方法论来理解某件事的本来面目。这种方法通常也称为常识现实主义，这是您可能会找到的另一个术语或短语。

其次是伊曼努尔·康德，尽管他仍然强调理性主义和理性，但他稍微远离了自己，他更多地强调自主认识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作为意义的中心。他更进一步说，因此，我们无法了解某件事的真相。现在，对于康德来说，他并没有说得那么远，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或者每个人都想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他只是强调人类已经具备了范畴和心灵的结构。

思维是一个网格，它过滤数据并决定我们如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头脑中已经存在了结构，因此我所了解的事物与它的真实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再说一次，我的感知和了解与现实中客观的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所反对的怀疑论。第三件事就是简单地提到，因此，康德对后来的诠释学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思考自我还是解释对象之间的划分上。现在，为强调将思考自我作为意义的中心铺平了道路，再次期待后来的以读者为导向的方法。

而且，最后一个，他的信仰和历史脱节，或者他的神学历史脱节，再次强调，如果圣经作者在写神学，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没有在写历史。因此，这些人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给我们留下了强调人类推理、人类理性、人类思维的遗产，强调人类能够理解和认识某些事物。稍微向前推进一点，不是在时间上移动很多，而是从视角上移动一点，我想讨论另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生活在1768年至1834年，即1834年的早期阶段。十九世纪。

施莱尔马赫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对神学、诠释学和圣经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被一些人称为神学之父或诠释学之父。我们回到施莱尔马赫，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谈谈他的思想和对诠释学的贡献。

但当我们讨论作者意图时，我们会再次回到他身上。施莱尔马赫可能是讨论作者意图的关键人物。请记住，以作者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的解釋方法。

大多数人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他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的主要目标。尽管许多人不一定同意或赞同他的处理方式和解释方式，但大多数人仍然将他视为解释学之父，因为他强调作者的意图。正如我所说，他虽然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但他对诠释学做出了贡献。

施莱尔马赫还在启蒙运动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写过文章，强调人类推理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以及人类理性实际了解某些事物的能力。换句话说，信仰既是理性的，也是科学技术的。然而，有趣的是，施莱尔马赫对此做出了反应，对这种对信仰、推理和科学的强调做出了反应，并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受到理性和科学的知识方法的限制。

但相反，与当时纯粹的理性真理和神学教条不同，施莱尔马赫在追求知识时强调创造力、经验和虔诚。换句话说，对他来说，解释学是通过密切关注人类思想和语言的本质而发展起来的一般理解规则的应用。现在这对施莱尔马赫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强调人类思想，他强调创造力，他强调精神体验，他认为理解和解释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理解圣经文本，或者理解文本，就像理解一个作者或理解另一个人一样，这就是人类作者。

因此，现代解释者和文本作者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解释学来克服。解释学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与人类作者之间的距离。因此，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重建或再现作者过去的行为。

换句话说，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他说，是的，我们看文本的语法，我们看文本的历史背景，我们看文字，但对他来说，解释主要是心理上的。再说一次，由于他的一些哲学理解，对他来说，主要目标甚至是超越文本，理解作者的思维过程，有点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上。因为根据他的说法，我们与人类作者有共同点。

因此，我们能够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站在作者的心里，我们能够揭示作者写作圣经文本的真实意图。因此，施莱尔马赫开始**强调解释学和理解某些事物的正确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观察文本并得出正确的解释，而是超越这一点，从心理上提出问题：作者过去的行为以及作者打算做什么。**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的遗产是第一，**强调作者的意图。**

我们将看到解释学开始，解释学似乎开始于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或在文本背后恢复文本历史背景的方法，以及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的作者意图。我读过的许多释经学或圣经解释教科书都有与此类似的措辞。解释的主要目标是把自己置于作者的立场上，这实际上接近于我所知道的一本解释学教科书中的精确引用。

这样文本就成为理解作者、重构作者意图的窗口。再说一次，今天，即使今天仍然如此，尽管我们的做法可能与施莱尔马赫不同，但大多数解释者，特别是福音派解释者，仍然会继续认为解释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作者的意图。最主要的是，文本的意思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稍后当我们开始谈论以作者、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解釋方法时，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一点。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已经拥护这样的观点：解釋的目标是恢复作者的意图。施莱尔马赫思想影响诠释学的另一个方面是通常所说的诠释学圈。

施莱尔马赫说，阅读一篇文章时，人们试图通过理解各个部分来理解整体。同样，通过了解各个部分，人们可以了解整体，或者可以了解整体。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理解分阶段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次性全部发生的事情。

当一个人在这个循环中工作时，在整体和部分之间来回走动，理解就会分阶段出现。对作者对文本意图的理解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不是一次性全部完成。因此，我们特别研究了影响诠释学的非圣经认识和理解方法，不是全部，而是非圣经方法。

再次，回到弗朗西斯·培根和他的归纳科学方法，勒内·笛卡尔和他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并强调通过理性思维、自主思维自我认识事物的能力，约翰·洛克建议我们可以将某事视为空白石板，即简单地观察事物，并且通过感官知觉和数据经验来填充空白石板。然后是伊曼努尔·康德，他也强调理性思考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康德引入了自主思考的自我，其效果是，我们对某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并依赖于人类思维中已经存在的类别和结构的。

然后是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他现在开始强调，只对人类理性和科学方法做出反应，现在强调经验、虔诚和创造力。所以解释的目标，解释学的目标，现在是恢复文本背后作者的意图，从心理上，理解作者的思维过程和作者的思维过程。所有这些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诠释学的处理方式和思考方式。

再说一遍，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的解释学方法不仅受到圣经解释者的影响，而且更普遍地受到潮流和历史运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与我们如何知道某事，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如何感知外部事物进行斗争。世界，我们如何感知像文本这样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诠释学教科书以及我们思考圣经解释的方式。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超越，我们将超越这些数字，作为 17、18 和 19 世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将向前迈进，开始研究一些最近的神学、哲学和诠释学思想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圣经文本的方式。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首先考察一个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汉斯·古尔格·伽达默尔。因此，下一次会议，我们将继续探讨我们的诠释学根源，以及影响我们今天对《旧约》圣经解释的思考方式的一些影响。